

## 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史觀意識析探

任允松\*

### 摘要

教育為立國之本，童蒙教育對個人知識的培育與人格的形成，尤其具有重大影響。唐代童蒙教育的教材在既有基礎上發展，由單純的識字教材，擴展到道德、知識、應用等方面的教育。唐代的敦煌，不僅官學興盛，民間蒙學亦十分普及。今幸賴敦煌石室大批寶貴的唐人寫本重見天日，並透過其中的蒙書寫本——《古賢集》，使我們能在千載之後，得以一窺唐代蒙學教科書的原貌。

本文探討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內容、體例、歷史演變，析論這部歷史教科書對於唐代敦煌地區的史料價值，並檢視這部蒙書所蘊含當代人民的史觀意識，分析編撰者撰史的思想意念，進而對當代庶民階層的歷史意識，有更整體而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敦煌、蒙書、古賢集、史觀意識

## A Study on the “*gu-xian-ji*” ’s historical sense in DunHuang Handwritten Books

###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country. And the initiative education has the heavy effect to Personality Molding.

A textbook for ignorant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a Remarkable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DunHuang, not only official but also private education are popular. By “*gu-xian-ji*”, we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 documents of DunHuang Handwritten Books and the mass historical sense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sure its historic-material value of this book regarding the Tang Dynasty history through proofreading the content, the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 test book, to inspect the meaning of the mass historical sense, and to analyze the author’s ideas of compiling

---

\*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historic documents. In other words, I hope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historical sense in DunHuang thoroughly and deeply.

**Keywords:** DunHuang, a textbook for ignorant people, gu-xian-ji, historical sense.

## 一、前言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裡的五萬多卷寫卷，在一千餘年的塵封後；在王圓籙不經意地發現打開與變賣、餽贈於他人後；在史坦因、伯希和與日本、俄國、美國……等相繼掠劫、拐騙、強搜…後，終於重見天日，再現於世人眼前。在這五萬多卷寫卷當中，摒除近九成的佛教及宗教性典籍，學者們的眼光與研究方向，最初放在「俗文學」的研究上，甚至有以「敦煌俗文學」，統稱整個敦煌文學範疇的論點。

然而，在眾多寫卷裡，有一批遭人們忽視、遺忘已久的文獻，有幸在敦煌學者的筆路藍縷下，重新付予其新的生命與歷史定位。這批文獻，學界統稱其為「敦煌蒙書」。

「蒙書」，在一般人的傳統觀念，普遍認為它只是供小孩子讀的識字教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村書」。但是敦煌地處西北邊陲，胡漢雜處，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其蒙書自有獨特的地方色彩，並且蘊含有俗文學的成分，以及俗文化的庶民意識。敦煌蒙書對於中下階層的教化功能，有著不同於正統史傳的道德偏執性，這是在其他文學載體上所難窺究竟的。

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一文<sup>1</sup>，以文獻學為基礎，從詠史詩的文學體類、蒙書的教育功能、類書的事類來源等幾個方面，探討敦煌蒙書《古賢集》與中晚唐詠史詩盛行的文化動因，可謂開啓以蒙書論述當代文化的研究思維。

本文嘗試以敦煌講史類蒙書《古賢集》為論述主體，透過體裁分析、

<sup>1</sup> 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收入《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2007年5月。

內容分類、引例及出處的統計，與當代庶民歷史教育的相互關照，論析此書所內蘊的史觀意識。

## 二、敦煌講史類蒙書—《古賢集》

《古賢集》是敦煌蒙書中，極具特色的一種蒙學讀物。它是以七言歌行體的詩歌形式，歌詠歷史人物的孝友、勤學、誠信、忠貞等事蹟，用來教示學童的通俗讀物。歷史掌故、人物事蹟的內容，加上歌行體的形式，在教學上的設計，就是要讓兒童易於誦讀、記憶。在灌輸孩童歷史知識，教導孩童忠孝仁義等人格規範與道德約束的同時，也能豐富學童的寫作題材與表達的技巧。

敦煌寫本《古賢集》蒙書的體裁形式，與唐代通行的《讀史編年詩》<sup>2</sup>類似，同屬「詠史詩」一類。項楚《敦煌詩歌導論》<sup>3</sup>、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sup>4</sup>兩書，在校錄《古賢集》時，均視其為「詠史詩」。韓建瓴〈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sup>5</sup>認為：「敦煌遺書中有一首唐詩，名曰《古賢集》。」可見《古賢集》具有「蒙書」、「詩歌」雙重成分。

《古賢集》為七言歌行體的長篇詩作，後世不傳，歷代史志目錄也未著錄。據現已公佈的敦煌寫卷，可見到的敦煌本《古賢集》，共計 9 件<sup>6</sup>。根據這些寫本「殘卷」，我們得以目睹這篇失傳千年的民間通俗歷史教育蒙書全貌。

### （一）敦煌蒙書的分類

#### 1. 敦煌蒙書的分類

敦煌蒙書，作為敦煌地區各類學校<sup>7</sup>的教材，多為中原傳入，其所反

---

<sup>2</sup> 《讀史編年詩》為趙嘏之作，與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時代、階層、性質相近，同屬中晚唐文人大型詠史組詩。

<sup>3</sup>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頁191-194。

<sup>4</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147-153。

<sup>5</sup> 韓建瓴，《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敦煌本《古賢集》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150-176。

<sup>6</sup>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10月），頁780。提到該書目前已有著錄者11個寫本：S.2049、S.6208、P.2678、P.2748、P.3113、P.3174、P.3929、P.3956、P.3960、P.4972；DX2776。

<sup>7</sup> 敦煌地區的學校依不同時期，有縣學、州學、寺學之分，其輕重與規模亦隨統治當局而有所消長。見鄭阿財、朱鳳玉，《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映的不僅是敦煌地區的特殊情況，也適度地呈現中原地區蒙學的普遍情況。蒙書發展流衍至唐代，就內容與形式上已漸趨多樣。對於敦煌蒙書的分類，學者有不同的分類與看法。

蒙書為小學支流餘裔，至後世而萌生多方，遂與原本圖書分類中的「小學類」日漸分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序：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相參並列，而小學亦多岐矣。<sup>8</sup>

而後，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金跋》將古之小學析分為「字書」、「蒙求」、「格言」三類，並對蒙書的性質、源流、類別有明確的論述<sup>9</sup>。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將隋、唐時代的蒙書分為「識字教育」、「思想教育」、「知識教育」三大類<sup>10</sup>。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將敦煌蒙書分為「識字」、「教育」、「運用」三類<sup>11</sup>。梁勵〈古代啓蒙歷史教材芻議〉<sup>12</sup>，將蒙學讀物依內容分為：「識字課本」、「社會歷史知識課本」、「儒家典籍蒙學教材」三類。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sup>13</sup>，將古代蒙學教材分為「綜合類」、「倫理類」、「歷史類」、「詩歌類」、「名物類」、「工具類」六類。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將敦煌蒙書分為「識字類」、「知識類」、「德行類」三類<sup>14</sup>。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sup>15</sup>，依據敦煌蒙書的教育功能，分為「識字」、「知識」、「教化」、「應用」四類。

---

2007年12月)。

<sup>8</sup>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3月)，頁829。

<sup>9</sup>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3月)，頁605-606。

<sup>10</sup> 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頁7。

<sup>11</sup>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年8月，頁104-107。

<sup>12</sup> 梁勵，〈古代啓蒙歷史教材芻議〉，《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6：3，江蘇，2000年7月。

<sup>13</sup> 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語文學刊》，第四期，山東，2001年，頁9。

<sup>14</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7-8。

<sup>15</sup> 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文化教育》，34：2，甘肅，2005年。

上述諸家分類，實乃從蒙書的「體」、「用」著眼。再觀張永萍所分的「教化類」與鄭阿財所分的「德行類」<sup>16</sup>，書目內容完全一樣，此即說明傳統蒙書的教化內容，是以品德教育為中心思想。這也突顯出敦煌地區童蒙讀物的豐富內容和多樣性題材。除極具地域特色外，更不離中原傳統中國的母體思維。而這個母體思維正是維繫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穩健運作，支持宗族家庭倫常秩序的儒學道統。這股內蘊的教化思想，藉由《古賢集》編纂者其「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的教育目的，自然又順理融入在當時當地的歷史教材之中。

## 2. 敦煌蒙書的編纂形式

敦煌蒙書以不同的體式編纂，具備不同的功能性與教育目的。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一書，收錄：《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百家姓》、《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上大夫》、《雜抄》、《孔子備問書》、《古賢集》、《兔園策府》、《九九乘法歌》、《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蒙求》、《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夫子勸世詞》、《一卷本王梵志詩》等篇。筆者依其內容，歸納出敦煌蒙書的編纂特色如下：

- (1) **字數不多**：少則 25 字的《上大夫》，至多也不過五千餘字的《碎金》。分量是非常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
- (2) **形式豐富**：有問答體、韻文體、散文體，多以方便兒童背誦記憶為考量。
- (3) **內容俚俗**：雜糅儒、釋、道三教的民間思想特質，且多有以日常生活的名物事理為主。
- (4) **道德性強**：多以忠孝節義、人格規範，為其精神主軸。
- (5) **地域性突出**：具有西北邊陲胡漢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質，內容多有以介紹當地名物、生活相關，以字、詞、義為主的「工具書」。

作為當時特殊時空背景下的庶民教育的童蒙讀本，上述的編寫特色，足以解釋敦煌蒙書何以具有如此強韌的生命力，能在唐、五代時期的邊陲地域，如此廣泛流傳。

### (二) 《古賢集》寫本校錄及研究

---

<sup>16</sup> 同樣列有《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王梵志詩》、《夫子勸世詞》。

有關《古賢集》的整理，1974年陳祚龍〈敦煌學雜記〉<sup>17</sup>，根據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6件《古賢集》寫本，進行校錄。1976年，陳慶浩〈古賢集校註〉<sup>18</sup>在陳祚龍的基礎上，加上英藏的2件《古賢集》寫本，重新進行校註，並提出了一些異議與補正。1984年，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sup>19</sup>第5章〈敦煌通俗詩考述〉，將《古賢集》列為「史事長篇歌詠」，立專節加以論述。1988年，韓建瓴〈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依據陳慶浩一文，參酌其個人研究發現，針對各家說法進行商榷。1993年，王三慶《敦煌類書》<sup>20</sup>，據陳祚龍與陳慶浩之文，收有錄文及註釋。2000年，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sup>21</sup>重新校錄《古賢集》。2002年，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對《古賢集》作了錄文重校與總結研究。

據鄭阿財、朱鳳玉《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sup>22</sup>、《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sup>23</sup>兩書著錄，專以《古賢集》為題的單篇論文，僅有陳慶浩〈古賢集校註〉、韓建瓴〈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及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3篇，而前2篇則著重於原文校錄。

從體制上來看，《古賢集》全篇以「君不見」3字作為起句的冒頭語，之後則是以七言40韻，80句，563字，集合古代諸聖賢事跡<sup>24</sup>，撰成長篇歌詩。全篇押韻的情形，共用真、魚、麻、支等四韻，皆平聲韻，形式十分整齊。基本上多以一句來歌詠一位賢人，間有用二句歌詠一位賢人，也出現以四句來歌詠姜太公事蹟，其中重複歌詠孔子兩次、漢武帝

<sup>17</sup> 陳祚龍，〈敦煌學雜記〉，《幼獅月刊》，40：5，台北，1974年11月，頁56-61。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岫廬文庫本陳祚龍《敦煌資料考屑》一書，該書收錄的〈敦煌學雜記〉一文中的《古賢集》，錄文已不同於1974年之初版，部分文字做了改正。

<sup>18</sup> 陳慶浩，〈古賢集校註〉，《敦煌學》，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第3輯，1976年12月，頁63-102。

<sup>19</sup> 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7月）。

<sup>20</sup> 王三慶，《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6月）。

<sup>21</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147-153。

<sup>22</sup> 鄭阿財、朱鳳玉主編，《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4月）。

<sup>23</sup> 鄭阿財、朱鳳玉主編，《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台北：樂學書局，2006年8月）。

<sup>24</sup> 書中仍有出現秦皇、王寄、晉文公的反面教材。

兩次，也有僅舉事證確並未專指人物的特殊事例。現將全文引錄如下<sup>25</sup>：

君不見：秦皇無道枉誅人，選士投坑總被墳。范睢折肋人疑死，誰言重得<sup>26</sup>相於秦。相如盜入胡安學，好讀經書人不聞。孔丘雖然有聖德，終歸不免厄於陳。匡衡鑿壁偷光學，專錐刺股有蘇秦。孫敬<sup>27</sup>懸頭猶恐睡，姜肱翫業不憂貧。車胤聚螢而映雪，桓榮得貴費金銀。造賦題篇曹子建，羅含吞鳥日才新。甯戚馳車齊<sup>28</sup>國相，朱買貧窮被棄身。晏子身微懷智計，雙桃方便煞三臣。許由洗耳潁川渠，巢父牽牛澗上驅。夷齊餓首陽山下，遊巖養性樂閑居。荆軻入秦身未達，不解琴吟<sup>29</sup>反自誅。蘇武落蕃思漢帝，身憑鴈足與傳書。燕王被囚烏救難，干將造劍喪其軀。為父報讎眉間尺<sup>30</sup>直諫忠臣伍<sup>31</sup>子胥。結草酬恩魏武子，萬代傳名亦不虛。靈輒一食<sup>32</sup>扶輪報，隨侯賜藥獲神珠。太公少年身不遇，八十屠鉤自釣魚。有幸得逢今帝主，文王當喚召同車。江妃淚染湘川竹，韓朋守死嘆貞夫。蜀地救火有鸞巴，發使騰星檢不賒。東方入海求珍寶，船頭迴面笑官家。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張騫奉使尋河路，王母乘龍戴<sup>33</sup>寶花。歎念閻浮漢武帝，費糧奉命度流沙。誰見牽牛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槎<sup>34</sup>。延陵留劍掛松枝，墳下亡人詎<sup>35</sup>得知。伯桃併糧身受死，參辰無義競妻兒。庭樹三荊恨分別，恆山四鳥嘆分離。割袖分桃漢武<sup>36</sup>帝，楊朱歧路起愁<sup>37</sup>悲。曾參至孝存終始，一日三省普天

<sup>25</sup> 錄文引自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頁 96-97。陳慶浩〈古賢集校注〉、韓建瓚〈敦煌本《古賢集》研究〉所錄異文，列於附註，以供參考。

<sup>26</sup> 「誰言重得」，韓建瓚作「隨緣信業」。

<sup>27</sup> 「孫敬」，陳慶浩作「孫景」。

<sup>28</sup> 「齊」，陳慶浩作「秦」。

<sup>29</sup> 「吟」，韓建瓚作「音」。

<sup>30</sup> 「尺」，韓建瓚作「赤」。

<sup>31</sup> 「伍」，陳慶浩作「午」。

<sup>32</sup> 「食」，韓建瓚作「飡」。

<sup>33</sup> 「戴」，陳慶浩作「載」。

<sup>34</sup> 「槎」，陳慶浩作「查」。

<sup>35</sup> 「詎」，陳慶浩作「具」。

<sup>36</sup> 「武」，陳慶浩作「明」。

<sup>37</sup> 「愁」，陳慶浩作「慈」。

知。王寄三牲猶不孝，慈母懷酬<sup>38</sup>鎮抱飢。孟宗冬笋供不闕，郭巨夫妻生葬兒。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高柴泣血傷脾骨，蔡順哀號火散離。思之可念復思之<sup>39</sup>，孝順無過尹伯奇。文王<sup>40</sup>得勝忘朋友，放火燒山覓子推。子夏賢良能易色，顏淵孔子是明師。集合古賢作聚<sup>41</sup>韻，故令千代使人知。

全文透過精簡通俗的詩句，概括歷史人物的經歷，便於學童朗讀背誦，快速的掌握歷史故事，既可敦品勵學，又可積累相關歷史知識；同時還能在詩歌韻味的浸淫中，培養作詩的興趣與墊基作詩的基礎。在內容表現上，正如詩的最後二句所說：「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

論及《古賢集》的時代，九件寫卷中，三件附有題記書寫年代。據 P.3113 的題記，可知為索祐住禪師於「後唐清泰貳年丙申三月一日」所抄寫，然因清泰二年（西元 935 年）為後唐廢帝乙未年，次年方為丙申年（西元 936 年），這當抄寫錯誤。另外，S.6208 只存月日及書寫者姓氏，年份的部分破失，以致無法可考。P.2748 卷背《百歲書》序和正文中間，為襯紙文字所隔開，且《百歲書》序有兩行寫在襯紙上，可知抄寫前已有襯紙，而襯紙上有「大中四年七月廿日」紀年，「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大中四年為西元 850 年，顯然 P.2748 這件寫卷應抄寫在大中四年以後。

此外，「孫敬懸頭猶恐睡」，《藝文類聚》引《後漢書》有：「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樑，人曰『閉戶先生』。」指的該是此典故。而《古賢集》抄本作「孫景」，當是避五代時後唐高祖石敬瑭的名諱而改。整體而言，《古賢集》雖然作者不詳，然從題記、抄寫情況與寫卷書風等，綜合考察，其流傳時代當在晚唐，至於創作時代，則很可能是在大型詠史組詩與蒙書盛行的中、晚唐時期<sup>42</sup>。

### 三、從《古賢集》看詠史詩體蒙書、類書體蒙書的文化因素

「蒙書」多採類書形式編纂；如似類書書抄的《新集文詞九經抄》、

<sup>38</sup> 「酬」，陳慶浩作「愁」。

<sup>39</sup> 「思之可念復思之」，陳慶浩作「思思可念護思思」。

<sup>40</sup> 「王」，韓建瓚作「公」。

<sup>41</sup> 「聚」，陳慶浩作「字」。

<sup>42</sup> 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頁 98。



類句體的《蒙求》、文賦體的《兔園策府》、問答體的《雜抄》和詩篇體的《古賢集》。這些體式均似歷代類書，就功能論、性質論，顯然是作為童蒙教材之用，歸屬「蒙書」一類並無不妥；從編纂的形式論，與類書如出一轍，同樣具有實用的功能，歸入類書也不為過。因此自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有從類書視角來考究，有從蒙書面向來探研。這些看似分歧，實則有其一定的脈絡，也凸顯了蒙書體制與類書的密切關係。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金》跋〉提到：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sup>43</sup>

足見類書與蒙書在體例形式與功能作用上頗多交涉，諸家目錄著錄此類書籍時皆收入類書。實際在民間使用上則是取便童蒙，則又歸屬蒙書。如此分歧，蓋以文化階層不一，視角不同，歸類自然有異。不僅類書與蒙書存在這樣密切且糾葛的問題，就是類書與詩歌，蒙書與詩歌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 （一）《古賢集》的詠史詩體文化因素

王三慶在研究敦煌類書時，將《李嶠雜詠·張庭芳註本》與《古賢集》歸為「詩篇體之類書」。按李嶠《雜詠》，全編 120 首，乃採用與類書體制相同而寫作的大型五律詠物組詩。持與初唐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等相較，其標目與分屬門類相合，詩題序列亦一致，顯見初唐代文人詠物風潮與文士編纂類書之密切關係。任二北以為：「中唐胡曾與唐末周曇，各有詠史詩百餘篇。其詩亦曾配合說白，講吟於市廛或宮廷間。」<sup>44</sup>對於詠史詩與講史關係有具體深入研究。1994 年，張晨〈傳統詩體的文化透析－《詠史》組詩與類書編纂及蒙學的關係〉<sup>45</sup>，提示了詠史組詩與童蒙教育的關係，並且留意到詠史組詩與類書、蒙學之間的關係。

中晚唐的趙嘏、胡曾、周曇所創作的詠史詩，呈現的意涵與東漢以

<sup>43</sup>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年 3 月），頁 605-606。

<sup>44</sup> 任二北，《唐聲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9。

<sup>45</sup>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2 月）。

來詠史詩的傳統，及唐代大小李杜等名家詠史詩的情懷與格調迥異。雖非上乘之作，然與民間純粹為學童而編寫詩歌體式的歷史類蒙書，其文學性仍然高出許多，並不能代表下層民眾的文化意識。

敦煌本蒙書《古賢集》，不著撰者，蓋為中晚唐時期從事民間私塾教育的基層知識份子所撰作<sup>46</sup>，用以作為民間童蒙教育的歷史教材，所呈現的自然更貼近廣大民眾的心理，而其形式體制與功能，足以說明中晚唐時期，蒙書、類書與詠史詩相互交涉的現象。

《古賢集》是歷史教育的詩歌體蒙書，將典範的歷史人物彙括入詩，以七言長篇呈現。就詩歌的觀點論，《古賢集》的流行自然有詩歌發展上的文化因素存在，以詠史詩體類作為蒙書，對於中晚唐時蒙書樣式起到拓展之功。然中晚唐時期，詠史詩風行，許多詩人有意的創作詠史詩。像胡曾、周曇等人，動輒百首的大型詠史組詩，更是一時盛況，對當時的歷史教育與童蒙教育有著一定的影響。因此《古賢集》的出現時期就特別的關鍵，如該書出現時期為中晚唐時期，則該書當是在這種流行文化環境下所產生，是屬於「被影響」下的產物。相對的，如該書是出現於盛唐後期到中唐前期，那《古賢集》一書的文學地位，就是屬於詠史詩的先驅。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之下，我們只能確定兩者間有著絕對的相關性，至於先後順序，還待後續研究<sup>47</sup>。

## （二）《古賢集》的類書體文化因素

《古賢集》的產生與流行，存在著傳統類書事類取向的文化因素。王三慶《敦煌類書》將《古賢集》的內容歸納分類為以下 15 類：

1. 勤學：匡衡、蘇秦、孫敬、姜肱、車胤、桓榮。
2. 文學：曹子建、羅含。
3. 窮達：甯戚、朱買臣。
4. 聰智：晏子。
5. 隱士：許由、巢父、夷齊。
6. 忠烈：荆軻、蘇武、燕太子丹、干將、眉間尺、伍子胥。

<sup>46</sup> 韓建瓚，〈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從其仿古七言古風體的形制推論，認為該書應該創作於盛唐後期到中唐前期，並認為它是一首文人詩作。

<sup>47</sup> 見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頁 104-106。

7. 報恩：魏武子、靈輒、隋侯。
8. 知遇：太公、文王。
9. 貞烈：江妃、韓朋、貞夫。
10. 方術：鸞巴、東方朔、董仲舒、孫賓。
11. 神仙：張騫、王母、漢武（明）帝、牽牛、織女。
12. 兄弟：田真兄弟、恆山鳥。
13. 敦信：延陵季子、左伯桃、參辰。
14. 慈惠：漢武帝、楊朱。
15. 孝友：曾參、王寄、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

該文又說：

從以上諸人之排次，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識的把數人彙聚一處，有如類書之分類，實具類書性質，亦開《佩文韻府》等以韻文分類檢索諸類書的開端。<sup>48</sup>

除了人物的次序排列外，《古賢集》的內容，在人物、事類的來源方面，明顯的是依憑當時流行的類書。這正說明了《古賢集》編排形式，具有類書分類隸事的特質。

鄭阿財將全文 80 句，依內容分爲：「以特殊表現晉升仕宦者」、「勤學不倦終至有成者」、「聖賢爲後人景仰者」、「思想行爲實爲高士者」、「效忠國君者」、「報恩復仇，矢志不忘者」、「神話傳說故事」、「特殊友誼堪足傳揚者」、「孝親堪爲表率者」、「其他」，共計 10 類。雷僑雲分爲：「孝順類」、「友愛類」、「勤學類」、「聖賢類」、「文章類」、「仕宦類」、「忠臣類」、「高士類」、「貞節類」、「朋友類」、「恩仇類」、「神怪類」、「求佛類」<sup>49</sup>，共計 13 類。儘管類別項目名稱不同，共同點是突顯出它具有分類隸事的類書體特質。

《古賢集》歌詠的歷史人物，除了見諸於敦煌寫本 P.2524《語對》外，其中有部份人物也見諸於《纂金》、《略出纂金》、《事森》、《蒙求》、《雜抄》。又有《事林》、《齟齬書》、《孝子傳》內容互見的現象，足以說明蒙書與類書關係，《古賢集》的情況更是具體例證。

### （三）《古賢集》的蒙書特質

<sup>48</sup> 王三慶，《敦煌類書》，頁 121-122。

<sup>49</sup> 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年 9 月），頁 96-100。

《古賢集》目前共有 9 個寫卷，且寫本多為與其他詩歌共抄，足見其當時流行之盛。加上它的七言歌行體形式，內容為歷史人物的事蹟歌詠，全文字數不多，用詞淺顯俚俗，尤其是末兩句「集合古賢作眾韻，故令千代使人知。」儼然就是說教的口吻，教育意味十足。

陳祚龍認為《古賢集》，是與《太公家教》等作品同類的蒙書。他說：「事實上它只係以詩歌的形式，且用古往『聖賢豪傑』的行跡，作為敘述的中心。另外，再以淺顯的字句，配合簡單的音韻，而將中華古往的『人文史』摘要地使其浮現於『集』中！試問它的用途，如不是養蒙訓俗，還是什麼呢？」又說：「而那種『嚴父教』說起來，可就與中古流行的《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孔子項託相問書》、《崔氏夫人訓女文》…，以及這種《古賢集》，不但都得謂為當時敦煌『文士』用以訓俗的『蒙書』，而且悉應視為當時敦煌『俗文學』的一些代表『傑作』！」<sup>50</sup>

就其內容選材與形式，《古賢集》道地就是一種歷史類的童蒙教科書，並且兼具了內容豐富、易於背誦、事例明確、道德性強等，多項蒙書特性。

#### 四、《古賢集》的史觀意識分析

史傳記載以「事」為重，事過境遷後，歷史事件總會留著難以詳述的模糊地帶。至於歷史人物的樣貌、個性，雖見載於史傳中，然其「功過事蹟」才是史傳記載的重心。童蒙讀物的編纂者充分運用個人想像，將歷史人物形象具體化、個性鮮明化，復生在編纂者所處的時空下。基於史傳重「事」；蒙書重「人」的特色下，從《古賢集》的人物歸結中，可以洞悉出此書的歷史教育觀點，凸顯其在教育上的特色與價值。

##### （一）重史、崇史的文化風尚

唐初之時，令狐德棻曾上書高祖修史，曰：「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雜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蹟湮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sup>51</sup>。於是高祖詔令中書令蕭瑀等，纂修魏、梁、陳、北齊、北周、

<sup>50</sup> 韓建瓚，〈敦煌本《古賢集》研究〉，頁 163。

<sup>51</sup> 《舊唐書》卷 73，令狐德棻傳。

隋等朝的歷史。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再敕令纂修五朝史<sup>52</sup>。計唐初所修的官史，有令狐德棻、岑文本《周書》、李百藥《北齊書》、姚思廉《陳書》、魏徵《隋書》。自武德以後，還有私人纂修，鄧世隆、李延壽、李仁實等，前後修撰國史，頗為當時所稱<sup>53</sup>。李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稱為「南北史」，凡 180 卷，頒行於當代<sup>54</sup>。」私人修史較為聞名的，尚有王通《玄經》，劉允濟《魯後春秋》，張昌齡《古文紀年新傳》，元行沖《魏典》，吳兢《梁史》、《齊史》、《周史》、《隋史》，敬播《隋略》，丘悅《三國典略》，蔡引恭《後梁春秋》等。一史撰成，名留千古。無怪乎一時文人都嚮往修史，尤以能修國史為榮。

然而這股纂修正史的使命與期盼，使一些中上層文士在無法真正參與修史的遺憾下，部分轉為其他文學體裁的創作，其中一部份就轉向了童蒙教材的編寫。

從唐代上行下效的重史觀念，到史傳文學本身的多元體裁內容，無一不為歷史類蒙書提供了蓬勃發展的溫床。再加上士人本身的使命感與不可抑制的才學，唐代歷史類蒙書的興盛與高度成就，乃是必然趨勢。

## （二）官方正統的史觀意識

唐代的重史觀念從官方到民間，從在朝到在野，深植於士人心中。儘管編寫史書的目的不同，但是其對於歷史觀感的價值判斷，自有共識。從上述唐人所編正史的列傳條目中，可見其傳承自《史記》、《漢書》、《後漢書》。先看《史記》的列傳，太史公除了將個人獨自或並列專傳之外，另闢有儒林傳、循吏傳、酷吏傳、貨殖傳、游俠傳、佞幸傳、滑稽傳、日者傳、龜策傳。《漢書》亦有儒林傳、循吏傳、酷吏傳、貨殖傳、游俠傳、佞幸傳；《後漢書》則有宦者傳、儒林傳、文苑傳、逸民傳、烈女傳。其列傳目的無非是將人格、品行足堪典範的平民小卒也能名流青史，供後人學習效仿。

再看唐代當朝所編修的正史列傳部分，《周書》：儒林傳、孝義傳。《北齊書》：文苑傳、儒林傳。《梁書》：孝行傳、儒林傳、文學傳、

<sup>52</sup>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08月），頁30。

<sup>53</sup> 見《舊唐書》卷73，令狐德棻傳。

<sup>54</sup> 《舊唐書》卷73，李延壽傳。

處士傳。《陳書》：孝行傳、儒林傳、文學傳。《隋書》：誠節傳、孝義傳、儒林傳、文學傳、隱逸傳、烈女傳。《南史》：儒林傳、文學傳、孝義傳、隱逸傳。《北史》：儒林傳、文苑傳、孝行傳、節義傳、隱逸傳、烈女傳。<sup>55</sup>

從上述七部官修正史所列的列傳部分，可以清楚看到唐人的官方史觀，仍然以儒家道統的忠孝節義、學優則仕為主，比較特別的是其中多部史傳中列有隱逸傳，這顯示出了，道家思想在有唐一代，還是佔有一席之地。

《古賢集》80句韻語中所引的60位人士，如依史傳正規編法，可將其列傳如下：

1. 孝義傳：曾參、王寄（董黯）、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
2. 儒林傳：孔子、顏淵、子夏。
3. 文苑傳（文學傳）：匡衡、蘇秦、孫敬、姜肱、車胤、桓榮、曹子建、羅含。
4. 誠節傳（節義傳）：荆軻、蘇武、燕太子丹、干將、眉間尺、伍子胥、韓朋、延陵季子、左伯桃、參辰、魏武子、靈輒、隋侯、田真兄弟、恆山鳥。
5. 隱逸傳：許由、巢父、伯夷、叔齊。
6. 烈女傳：江妃、貞夫。
7. 宦者傳：晏子、太公、寧戚、朱買臣、張騫。
8. 處士傳：鸞巴、東方朔、董仲舒、孫賓、楊朱。

從上述歸類，《古賢集》的紀傳體式顯然若揭，編纂者的史傳素養及史官意識，更是融入在這本敦煌當地流行的歷史教科書中。

### （三）庶民大眾的史觀意識

《古賢集》既具有類書的性格，又採近體詩的文體而成編，鎔類書、詠史詩於一鑪，用以進行民間童蒙歷史知識的教育。在民間發揮了正史與高文典冊所不及的影響力，呈現出的是民間百姓的歷史觀。它不是要抒發個人之感懷，也無意刺上諷下，它只想藉文中所詠忠孝節義、智信仁勇的典範式人物，以其平易的詩句，造語的淺俗，讓孩童便於琅琅上

<sup>55</sup> 楊家駱編，《點校本二十四史》（台北：鼎文書局，1983-1987年）。

口，形象鮮明而易記。

《古賢集》中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呈現的是庶民的歷史觀。與傳統的史傳或人事的詠史詩，乃至一般文士大型詠史組詩，均存在著明顯的落差。其中所歌詠的內容，出現了不少正史所不載的人物事蹟，有的見於稗官小說，有的則是出於民間傳說，正是這種雅俗文化彼此間高度落差的最好例證。例如「江妃淚染湘川竹，韓朋守死嘆貞夫」、「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誰見牛郎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查」、「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等，其中有些人物故事是敦煌通俗文學作品描寫的題材，據陳慶浩對《古賢集》註釋中初步引到的敦煌文學作品就有近 20 種，其中不僅人事同出，對歷史人物事蹟的評價相近相承，這些共同性說明了《古賢集》所歌詠的歷史人物、事蹟，在當時社會中，特別是敦煌這個特定環境中，廣泛流傳的通俗屬性，呈現的是底層社會的歷史文化價值觀。

七言詩體的《古賢集》，集合古代賢人的事蹟加以歌詠，內容通俗易懂，且契合廣大民眾共同的心理需求，它的作用是普及歷史知識，宛如一部通俗的歷史教科書簡編。《古賢集》是廣大民眾思想、文化的投射，是小傳統的民眾文化意識，同時也是一般民眾獲取歷史知識主要便捷的渠道。

《古賢集》出現的人物，共 60 人。人物時代及典故出處如下表列：

年代、帝王	人名	出處
傳說	牽牛、織女	
堯	許由、巢父	《史記·伯夷列傳》
堯	江妃（湘夫人）	《博物記·史補》
西周	姜太公、周文王	《史記·齊太公世家》
西周（周宣王）	尹伯奇	《琴操·履霜操》
西周	伯夷、叔齊	《史記·伯夷列傳》
春秋	孔子、顏淵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論語·衛靈公》、《史記·孔子世家》
春秋 （西元前 507～前 400）	子夏	論語學而篇第一
春秋 （西元前 505～前 436）	曾參	《論語·學而篇》
春秋（齊桓公）	甯戚	《淮南子·道應訓》

春秋（齊宣公）	靈輒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齊宣公）	魏武子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	晏子	《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晏子諫》
春秋晉文公	晉文公、介之推	《琴操·龍蛇歌》
春秋晉侯	參辰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楚莊王）	伍子胥	《史記·伍子胥列傳》
春秋	高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春秋（楚文王）	左伯桃	《烈士傳》
春秋（吳王闔閭）	干將、眉間尺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春秋吳王壽夢	延陵（季札）	《史記·吳太伯世家》
戰國時期（秦昭王）	范雎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戰國時期（秦昭王）	蘇秦	《史記·蘇秦列傳》、《戰國策·秦》
戰國時期	孫敬	《藝文類聚》
戰國時期（燕王喜）	燕太子丹	《燕丹子》
戰國時期（燕王喜）	荆軻	《史記·刺客列傳》
戰國時期（宋康王）	韓朋、貞夫	搜神記卷十一；韓朋賦
秦始皇嬴政三十五年	秦皇	《史記·秦始皇本紀》
西漢（武帝）	漢武帝	《史記·佞幸列傳》
西漢（武帝）	蘇武	《漢書·蘇武傳》
西漢（武帝）	張騫、西王母	《史記·大宛列傳》
西漢（武帝）	東方朔	《搜神記》
西漢（武帝）	董仲、孫賓	〈董永變文〉
西漢 （西元前？～前115）	朱買臣	《漢書·朱買臣傳》
西漢景帝。 （西元前179～前117）	司馬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西漢元帝	匡衡	《史記·張丞相列傳》、《西京雜記》
西漢	隋侯	《淮南子·覽冥訓》、《搜神記》
西漢	董永	《搜神記》、《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新莽	蔡順	《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東漢	桓榮	《後漢書·桓榮傳》
東漢	姜肱	《後漢書·姜肱傳》
東漢	鸞巴	《後漢書·鸞巴傳》



東漢	漢武（明）帝 <sup>56</sup>	《後漢書·西域傳》
東漢和帝	王寄（董黯）	《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東漢	郭巨	〈故圓鑿大師二十四孝押 座文〉、《目蓮緣起》、〈秋胡變文〉、《搜神記》《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三國	曹子建	《三國志·魏書》
三國	孟宗	《三國志·吳書》
晉	車胤	《晉書》
晉	羅含	《晉書》

根據上表，歸納出正史有載的歷史人物共 48 人，屬於神話（傳說）故事或人物的有 12 人。從人數統計上，可以清楚看見《古賢集》作為歷史教材的基本元素「徵信」是具備的，不因他是小兒書而有所折扣，畢竟歷史教育的宗旨是求真、求實的。

再觀看其時代劃分：神話傳說時代共 6 人，周朝共 5 人，春秋戰國共 24 人，秦漢時代共 19 人，魏晉共 4 人。春秋戰國與秦漢時代就占了 43 人，足見其在人物的取材上，仍以信史所能掌握的為主。其中典故出於《春秋》經傳、《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這些正史，以及《論語》、《淮南子》經典的占了 32 則。而大部分典出《史記》，或者說是《史記》有載，這方面透露出了《古賢集》的編纂著並非低階的知識階層，該是中上階層的文士。

《古賢集》的編纂者，當是受了當代的文人創作風格與社會風氣的直接影響，當其在編纂這部歷史教材的同時，除了顧及一般民眾對於歷史人物的普世價值外，仍兼顧到學子們對於科舉考試的需求性。

再就典範人格特色來看，勤學及仕宦者有 11 人。效忠、盡孝者有 11 人。兩項共占了 22 人，可見傳統儒家教化已深蘊其中。《古賢集》所「集」的「古賢」是確有其人，希望學童能見賢思齊，為學童豎立一個清晰的學習典範。

《古賢集》在通過對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形象地反映了「世之所重，為學為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的儒家道德倫理觀念。而這正是整個中華民族，尤其是地理環境、文化背景特殊的敦煌地區所展現出的

<sup>56</sup> 陳慶浩以為此句應為漢明帝，韓建瓴以為漢武帝，當是。

最基層，也最道統的民間史觀。

#### （四）文本編輯轉化趨向

唐及兩漢的官修正史的編輯思想，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層，仕宦階級的主流思想，是一種社會菁英文化的體現。一般市民大眾的觀念與思想是很難在他們的編著中得到反映的。有幸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出現，得以使我們將關注的視野擴展到了當時的流行讀物和蒙學讀物，從中體察到編著者的思想重心，如何由體現社會菁英文化，轉向體現庶民文化的過程。

《古賢集》的編著者為適應普遍大眾需求，綜合儒家經典，刪繁節要，擷取嘉言粹語，以助應對進退、待人處事。這種對主流思想文化的綜合融創，既維護了統治者的政治化統治秩序，又適應了普遍民眾的道德需求，展示了編著者編輯思想的轉型過程。如《古賢集》中孝親堪為表率者：曾參、董黯、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的歷史事例，都能藉由簡單的詩句、故事，潛移默化地根植於讀者心中。從此可窺見在他們的思想軌跡中，平民化，抑或大眾化的思想意識，已逐漸成形。

那波利貞指出：「從貴族性的到庶民性的，從保守傳統到創關蛻脫，從莊重典雅到輕躁卑俗，這就是中國中世史時期向近世史時期的轉化。」<sup>57</sup>在這一轉化過程中，知識已不是社會菁英的專利，文化的消費群體，也由菁英階層擴展到了普遍大眾，文化消費群體的改變，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知識與思想，從而促使了這一時期敦煌蒙書的編著思想由菁英向大眾的轉化。由普遍文本成為經典文本，這既是傳播的過程，也是通俗與經典互化的過程，《古賢集》為我們昭示了從貴族走向平民，從菁英走向大眾，由俗而雅，直至成為經典的歷程。<sup>58</sup>

敦煌蒙書《古賢集》，是唐、五代時期流傳廣泛的歷史童蒙讀物，它反映了當時一種普遍、廣泛的歷史知識傾向，及實用性。而這種實用性包括了科學應制用的功利性，與生活行為規範、道德養成的實用功能性。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說：

和官方的史書不同，《古賢集》並沒有從三皇五帝、堯舜禹湯說起，

<sup>57</sup> 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

<sup>58</sup> 謝曉春，〈敦煌蒙書編撰的平民化傾向及其價值體現〉，《敦煌研究》，第6期，蘭州，2007年，頁99。

既不羅列改朝換代的過程，也不重視帝王將相的作用。他所歌詠的『古賢』十分龐雜，包括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乃至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然而在這些人物身上，卻寄託了下層民眾的是非觀念、道德標準。所以《古賢集》是一部體現普通民眾思想意識的通俗歷史教科書。<sup>59</sup>

這一時期，文化知識以不再為社會菁英所獨享，文化的消費群體在不斷的擴大，它必然地促進著編輯文本的越來越通俗化。再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看，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地區，在唐、五代時期，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及多元文化交匯的特點，其主流文化表現為一種簡約化、通俗化、生活化的大眾文化。主流文化群體的變遷，使編輯文本的通俗化、大眾化成為必然。<sup>60</sup>

再從社會文化發展的整體來看，知識普及率的提高必然地促使文化消費群體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其載體的內容與形式的通俗實用，正是在這種雙向互動中實現著知識與思想的大眾化，構成了當時廣泛的文化背景。<sup>61</sup>

《古賢集》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在內容取材與體式編輯上，體現了世俗化的特點，而這個世俗化包含的是：1. 編纂者的世俗化。2. 閱讀者的世俗化。3. 內容道德標準的世俗化。體式編輯上的歌行體與內容人物、事蹟、年代的雜亂無序，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的常態現象了。

## 五、結語

《古賢集》這一僅保存於敦煌藏經洞的唐五代民間歷史教育寫卷，說它是詠史詩也好，歸它為類書也行，不變的是它作為童蒙教材的編寫目的，80 句的韻語，60 位的歷史人物，藉由夫子之口，而滲入到民間的生活教育之中，口耳相傳的方式，潛移默化，成為敦煌當地民間歷史知識的來源之一。長期以來，在敦煌民間發揮了正史與高文典冊所不及的影響力，牽動著、塑造著民間百姓的歷史意識。

《古賢集》縱使內容豐富、教化蘊意深遠，但是其歌行體的體式，

---

<sup>59</sup>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頁 194。

<sup>60</sup> 楊秀清，〈社會生活的常識、經驗與規則及其思想史意義〉，《敦煌研究》，第 4 期，蘭州：2006 年。

<sup>61</sup> 謝曉春，〈敦煌蒙書編撰的平民化傾向及其價值體現〉，頁 97。

並無長篇大論的說明、註解與申論，主要還是歸因於其為「教材」的定位與「啓蒙」的性質。一套完整的教育流程且能達到教育目的，就必須是「中心思想」+「教材」+「受教者」+「施教者」。書中內文所論述的歷史人物典範即中心思想，蒙書本身即教材，啓蒙即為受教者的本質特性。而《古賢集》所具的80句七言詩的特點，正是應「施教者」而成。正因上述特點，「施教者」方能就內容的多寡、講解的深度、涉及的層面，與受教者的程度而做調整與控制。也因此，我們可以說《古賢集》是故意地內容粗淺、俚俗，目的是給「施教者」更大的自主與應用空間，套句現代名詞，即教師更具「教學自主性」。

研究過去的史觀思想，從上層知識份子的官修正史著手是容易的，而知識份子以外，屬於下階層的庶民大眾的想法為何，卻是我們很難深入去瞭解的。《古賢集》用的是淺白通俗的語言，表現的是鄙俚的俗文化，讓我們體認到敦煌的蒙書不僅可單純作為蒙書看待，還能夠結合其中的內蘊意識，重建敦煌地區甚至唐代的人文史、社會史等諸多面向的歷史原貌。

### 參考書目

- 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7月）。
- 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
- 王三慶，《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6月）。
- 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
-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8月）。
-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10月）。
-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
- 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9月）。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